

范鹏 总主编

陇上学人文存

郭晋稀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上学人文存

郭晋稀 卷

郭晋稀 著 赵逵夫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0198448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郭晋稀卷/范鹏总主编;郭晋稀著;
赵逵夫编选.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6-04335-6

I. ①陇… II. ①范… ②郭… ③赵…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
C53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8324 号

责任编辑:宋学娟

封面设计: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郭晋稀卷

郭晋稀 著 赵逵夫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7 字数 373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226-04335-6 定价: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编委会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连 辑 咸 辉

副 主 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连 辑 咸 辉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学术指导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珺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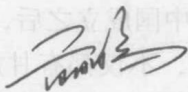
《陇上学人文存》编辑部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郭晋稀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心雕龙》专家，在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学及音韵、文字研究方面都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他严谨的学风、扎实的国学基础及学术上追求不断创新的精神在省内外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晋稀，字君重，1916年10月22日生于湖南湘潭株洲镇（今株洲市）袁家湾一个书香之家。先生自幼好学，1936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回湘潭后在新群学校任教。两年后考入国立师范学院（在长沙）中文系，抗战爆发后学校迁至湘西安化县之蓝田镇（其地今属涟源市）。因读书扎实、好学深思，受到骆鸿凯（字绍宾）、钱基博（字子泉）、钟泰（字钟山）等先生的器重。后因先生耿直，与学校管理人员发生冲突，立意转学，钟泰先生特请彭一湖专函去给国立湖南大学校长说项。1940年9月转学到国立湖南大学以后，钟、钱二位先生也是长短书信不断，或论学问、或谈作人，虽是师生，而情同父子和挚友。如钱子泉先生给先生信中说：“贤论《易》以阴阳、动静、消息、世变，而不在象数图书，最是通人之论。”“顷阅湖大期刊，说《庄》数则，极见心思。”“所寄校《庄》数十则，当为不易。”（按：“不易”指不可移易，确为定论）。郭先生由国立师范学院转入国立湖南大学不久，骆鸿凯先生由湖南大学移砚国立师范学院，钱基博先生在给郭先生的一封信中



说：“骆先生来院一谈，道及贤学问精进，为诸师所重。闻之欢喜。”骆先生也仍然关心他的学业。他给郭先生的一封信中说：“顷奉手札，并大著《邪母古读考》，均悉，甚佩！喻、邪、定三母相通，乃凯研求语根积十余年所悟者，惟以囿以方音，疑邪、从两母古读亦通，是以牵制未能言定。今得足下是篇，以为邪与从无预，论自不刊。”

在湖南大学（当时迁至湘西辰溪）在读期间又得杨树达（字遇夫）、曾运乾（字星笠）、马宗霍（名承堃，以字行）等先生的赏识。诸位先生当国家危亡之时随校迁徙，颠沛流离，然而克服种种苦难维持教学工作、淳淳教诲学生的精神，对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后先生每提及当时的老师，总是说：“教我治学，教我做人。”十分感激。尤其在湖南大学期间，得杨树达、曾运乾先生耳提面命，对他一生做学问在学风和研究方法方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时中文系总共不到二十人，学生在老师那里，比今日的研究生接触导师的机会还要多。先生每次去拜见杨先生，杨先生总命其坐书案旁，然后出示自己的研究文稿，告以有关问题前修之未密及自己的解决思路。曾先生也常常叫他至自己住处讲论治学之法，探讨一些具体问题。先生也常直陈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三《说鬲》篇：

湘潭郭晋稀学于湖南大学，从余治文字之业。于余说颇能有所领悟。一日走告余曰……

下引其语数百字。然后杨先生说：“善哉，君之说字也！”并就先生之说加以增订，而得“鬲”字的确解。文末曰：“余以事赴邵阳桃花坪，路过芷江榆树湾候车，客馆无事，因记余与晋稀所讨论者如此。”又附文字一小段：

晋稀又尝说“𡳿”字。谓许说“止”在“舟”上，“舟”非舟船之“舟”。《说文》“履”下谓：“舟”象履形，“𡳿”字谓“止”在“履”上耳。

古人入室则脱履，“止”在履上，故为前也。此说以许说纠许，亦深具妙悟，因附记之。

由此可以看出其师生间讨论学问的情形及相互情感。曾运乾先生对先生耳提面命，悉心指导，以后郭先生相当长时间中从事于音韵学的研究，同曾运乾先生关系很大。他在曾先生的指导下，于1942年春完成了七万多字的《等韵驳议》（原题“等韵发微”，杨树达先生改为今名）。7月先生毕业，任教于湖南第七师范。此年底曾先生在家燬于大火，家人函电交驰之下，在所不顾，而两次驰书给郭先生，招其回湖南大学任教。但因当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交通阻隔，邮政不畅，郭先生未收到此信。由此可见曾运乾先生实视君重先生为托命之人。1945年1月曾先生去世。在此期间郭先生任国立师范学院附中教员，1944年3月任国立师范学院（当时迁至溆浦，是屈原被放江南之野后南行最南端之地）助教，1945年经杨树达先生推荐，到贵州平越（今福泉县）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先生在国立师范学院，曾先生也常有书信，关心其学业。曾先生在一封署为四月六日的信中说：“月末在校情形如何，所读何书，有何新发见，乞于日内写信告我为盼。”另一封信中是接到郭先生提出希望假期到曾先生家读书的要求，虽然家中困难不小，也欣然答应。其他几位先生也一样，常予以具体指导，生活上也如同父子一样。

1942年先生在湖南大学毕业时，当抗战之际，国家艰难，人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常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骚扰，学校时时搬迁。有的教师即自愿组织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其从事教育者，将教学生看作传播中国文化命脉、鼓舞爱国思想的历史使命，亦甚为艰苦。马宗霍、骆绍宾先生几封信中除讨论学术，为先生的工作事提建议外，还委托他人以先容，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新中国成立后，经徐特立同志介绍，到北京，入华北革命大学政



治部研究班学习,1950年冬学习期满,1951年春到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任教。以后学校校名几经变更,但先生再未离开这个学校,直至1998年7月29日去世。先任副教授,后任教授之职,先后担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在社会兼职中,曾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顾问等。郭先生在高校任教五十多年,兢兢业业,教学深得学生欢迎。当时西北师范学院在全国招生,很多学生来自外省,南至广东、广西、福建,有些同学生活上不习惯,他都给予关心、帮助,所以不少同学毕业数十年后,仍同他有联系,对他抱有感激之情。195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虽然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不少精力,但还是抽时间读了大量的书,进行了几个课题的研究,如《杜诗系年》、《文心雕龙》研究。他作《徐文长年谱》,翻阅各种文献,抄录的卡片有十来斤重。同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一方面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态度,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既不随大流地无端伤害他人,也不会为了表现自己而说过头话。“文革”中他受到冲击,但能坦然对待。被关在牛棚的时间他除了劳动、接受批判,就读《毛泽东选集》。“文革”后期“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为越来越明显,“评法批儒”中校工宣队要他到各处去讲“法家人物”武则天,他婉言推辞。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随口乱说,作为一个学者也不能人云亦云。先生性情耿直,而处人随和,与同事相处融洽。他初到西北师院时讲授音韵文字训诂,这是他在中年以前最为用力之处。1952年介绍湘潭的彭铎(字灵乾)先生来西北师院。彭先生是教古代汉语的,当时学生教师人数都较少,首先要考虑各种课程都有专人讲授,故郭先生主动改教古代文学前半段。后来又因为元明清一段没有人上,他改教元明清文学。

先生从1959年开始留研究生,后来教育部规定有变化,所留学生改为“留校”。1961年又开始招研究生。他也常常指导青年教师的

读书、教学、科研活动。几十年中郭晋稀先生培养了大量人才,也为西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

郭晋稀先生知识面很宽,又因其深厚的根底,所以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建树。他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文心雕龙》研究。1961年在《高校六十条》颁布之后,全国开始了高校教材建设,中宣部负责人指示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理论的研究,并明确提出对《文心雕龙》要进行研究,以继承、发扬其理论精华。于是郭先生开始翻译《文心雕龙》,在《红旗手》(不久又恢复旧名《甘肃文艺》)上连载。1963年8月,他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年后被香港建文书局翻印,传播至港台学术界和日本、韩国等国际汉学界。这本书同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陆侃如、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选译》是1949年之后《文心雕龙》最早的新注本。这本书每篇前对全文有概括而精当的评论,注释准确而简要,译文流畅,又具有古文的典雅与节奏感,顺着译文读,就像是他在论述,而对照原文,又都扣得很紧。尤其反映了先生对《文心雕龙》结构的看法(见该书《养气》、《序志》二篇题解、注释及相关篇的题解),首次对《文心雕龙》的篇次作了调整。日本学者户田浩晓的《文心雕龙》一书(昭和四十七年东京明德出版社出版)列中国内地学者的著作三种,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之外,即郭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户田浩晓在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小史》认为,关于《文心雕龙》,“现代中国语的译本有特色者当推郭晋稀氏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和李景滢氏的《文心雕龙新解》”。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林田慎之助的《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若干问题》一文,肯定了郭先生关于刘勰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见《日本中



国学会报》1967年第19号)。意大利汉学家珊德拉教授曾对郭先生说,她研究《文心雕龙》就是从这本书入门的。

“文革”结束后,郭先生又发表了《〈文心雕龙〉的卷数与篇次》(《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试谈刘勰论创作思维的特点》(1982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交流论文)、《从刘勰的世界观看他的美学观、经学观和文学观》(《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等。对在《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前言》和题解、注释中的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论述,并同日本学者安东谅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关于〈文心雕龙〉下篇篇次——和安东谅君商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郭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全书的结构与《序志》所说完全一致,每篇的内容结构,也在《序志》中已点明。全书原分上、下两篇,即上、下两大部分,每部分有文二十五篇。《序志》中说: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按照郭先生研究所得,上篇依次与《序志》所说相对应:

《原道》:“本乎道”;

《徵圣》:“师乎圣”;

《宗经》:“体乎经”;

《正纬》:“酌乎纬”;

《辨骚》:“变乎骚”。以上五篇为文之枢纽,故云“文之枢纽,亦云尽矣”。

《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八篇为“论文”;

《杂文》《诸隐》两篇间乎文笔;

《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

对《书记》十篇为“叙笔”。以上二十篇论文叙笔，围别分明。

这二十篇各篇如何论文、叙笔，也有一定体例，这便是“原始以表时，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郭先生举例分析，皆合若符契。

下篇二十五篇同样结构严谨，有其章法。《序志》接着上面所引论上篇一段文字云：

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搞《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怛怛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

郭先生认为下篇二十五篇应与《序志》完全一致，因而作了五点校正：（一）将现行各本都列在《指瑕》后的《养气》《附会》移于《风骨》之后，《变通》之前。（二）校《序志》中“图《风》《势》”的“势”为“气”，因为在《风骨》篇中是以“风”“气”并论，故《风骨》之后应为《养气》而不应是《定势》。又《序志》中言“苞《会》《通》”，则《附会》应在《变通》之前。（三）移原列在《夸饰》后的《事类》于《通变》之后。《事类》是“据事类义”，属于文骨。《风骨》兼论“风”“骨”。以下两两相配，《通变》主风，《事类》主骨，故《事类》当在《通变》之后。（四）移原列在《夸饰》《事类》之后、《隐秀》之前的《练字》于《声律》之后，因《序志》中明言“阅《声》《字》”，《声律》《练字》不当分在两处。（五）移原列在《时序》与《才略》之间的《物色》于《夸饰》之后，《隐秀》之前，因为《物色》属于析采的范围，不当在《时序》与《才略》之间。

经郭先生的校理，则下篇二十五篇同样次序井然：

《神思》《体性》：“搞《神》《性》”；

《风骨》《养气》：“图《风》《气》”；

《附会》《变通》：“苞《会》《通》”。加上《事类》《定势》，以上共八篇，



属于剖情。

《情采》《熔裁》，郭先生以为“情”与“熔”属于情，“采”与“裁”属于采。两篇情、采兼论，故置于两部分之间。

以下《声律》《练字》《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物色》《隐秀》《指瑕》《总术》共十篇属于“析采”。

结尾五篇：

《时序》：“崇替于《时序》”；

《才略》：“褒贬于《才略》”；

《知音》：“怊怅于《知音》”；

《程器》：“耿介于《程器》”；

《序志》：“长怀《序志》，以驭群篇”。

经郭先生这样一整理，才真正显示出《文心雕龙》这部书是一部构思缜密、结构谨严的理论巨制，其《序志》也真正体现着“以驭群篇”的作用。

历来研究《文心雕龙》者不少，都未能发现《序志》在概括全书构思上这样的作用，所以一般标点《文心雕龙·序志》，也都将“摘神性，图风势（“势”应作“气”），苞会通，阅声字”中的“神性”、“风势（气）”、“会通”、“声字”当作一个词或词组看，未看出是分别指书中的两个篇目。

郭先生在《文心雕龙》篇次的研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据牟世金先生《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说：“台湾出版的多种《文心雕龙》论著，都列范文澜、杨明照、刘永济、陆侃如、牟世金、郭晋稀的著作为‘重要参考书’。”并特别指出，台湾学者李曰刚的《文心雕龙斟论》关于其篇次的看法，取了郭先生的见解。李曰刚先生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曾授业于黄侃。李氏此书被学者称作“博大精深之巨著”，王更生《文心

雕龙导读》一书中评论此书说：“他这部巨著实具有黄札、范注、刘释、杨校的优点。”这里只提到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注释》、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而没有提到郭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但牟世金在他那本书中将李书与郭书的篇目对照列出，证明基本上采用了郭书的次序，只是个别地方不同，并将改动之处扩大到了上篇。牟世金说：

至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始对《文心雕龙》的下篇有所调整。李书即主要据郭说改篇而又有新的增益。查郭书只改下篇（一九八二年出版《文心雕龙注》也是如此），李著则扩大到上篇之《杂文》《谐隐》二篇。

牟世金书中在将两书篇次作了对照后又说：

李曰刚的改篇，有的是根据郭晋稀的理由，有的与郭改不同，又提出许多自己的理由。

对此，牟氏在引述了《导读》中的一段话后说：

这说明作者的治学精神是极为严谨的，却不幸而将和唐写本的篇次一样的上篇也作了个别更易。这是否为智者一失，窃有疑焉。

郭先生是调整了看来确有窜乱的部分，而后代传本与唐写本一致的，没有更改，说明了郭先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李曰刚书中未提到郭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可能因为这只是一个选注本、选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在外面也影响不大，而且这是郭先生的第一本书，他的名字在港台还比较陌生。但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诂》在1982年正式出版之前，李曰刚的学生、台湾师范大学王更生博士于1979年初版、1983年增订再版的《文心雕龙研究》一书对《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有较详细的介绍，行文中也几次提到或引述《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但也没有提到该书在篇次上的创获，似乎也不是无意